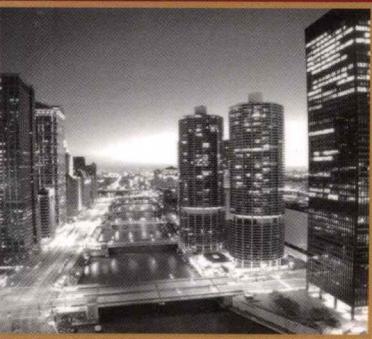


张明军
吴新叶 等◎著
李俊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均以崭新的形态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时代。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改革开始的起航，加之全球化的冲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波澜壮阔、势如破竹推进的同时，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也跃进实质的步伐渐进地走向深入。在这种改革强劲合力的推动下，中国在政治和社会生活等领域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书通过对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各要素的分析，力图探究其运作的基本机制，认识并把握这一变迁的内在规律，以解答政治社会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

Analysis of Current
China's Politics and Society

当代中国 政治社会分析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上海市政治学高地项目



当代中国 政治社会分析

张明军 吴新叶 李俊 等◎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分析/张明军等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8

ISBN 978 - 7 - 80211 - 728 - 0

I. 当…

II. 张…

III. ①政治 - 发展 - 研究 - 中国 - 现代②社会分析 - 中国 - 现代

IV. D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25036 号

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分析

出版人 和 龚

责任编辑 朱 虹 贾向云

责任印制 尹 琦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010)66509236 66509360(总编室) (010)66509350(编辑室)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465 千字

印 张 27.75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6.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目 录

第一章 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分析	1
一、政治合法性及合法性资源的涵义	1
二、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特征与资源	2
(一)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特征	3
(二)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资源	5
三、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历时性考察	15
(一) 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16
(二) 社会主义曲折发展时期	21
(三)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25
四、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隐患与重构	29
(一) 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隐患	30
(二) 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重构	34
第二章 当代中国政治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分析	40
一、当代中国政治权力结构形式及其形成	40
(一) 理论上的政治权力结构	40
(二) 实践中的政治权力结构	43
二、当代中国政治权力结构的特征	51
(一) 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性	51
(二) 政治权力的非制衡性	53
(三) 政治权力的“一头多元”性	54
三、当代中国政治权力运行机制	55
(一) 领导权、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横向互动机制	55

(二) 中央与地方权力的纵向互动机制	58
(三) 当代中国政治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	59
(四) 当代中国政治权力运行机制的特征	62
四、当代中国政治权力演变的趋势	65
(一) 党政权力的再融合	65
(二) 领导权对立法权领导的深化	68
(三) 领导权与司法权的再分立	69
(四) 领导权内部的分权与监督制约	70
 第三章 当代中国政治监督制约分析	 74
一、当代中国政治监督制约建构的基础	74
(一) 当代中国政治监督制约建构的理论基础	74
(二) 当代中国政治监督制约建构的国情基础	78
(三) 当代中国政治监督制约建构的国际条件	82
二、当代中国政治监督制约的体系、特征与功能	83
(一) 当代中国政治监督制约的体系	83
(二) 当代中国政治监督制约的特征	93
(三) 当代中国政治监督制约的功能	96
三、当代中国政治监督制约的问题与完善路径	100
(一) 当代中国政治监督所存在的问题	100
(二) 加强当代中国政治监督制约的路径选择	105
 第四章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分析	 111
一、理论界的民主与民主化之争	111
(一) 理论界关于民主的不同认识	111
(二) 几种典型的民主与民主化观点	113
二、当代中国的民主模式与民主道路	117
(一) 社会主义民主思想的形成	118
(二) 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模式的探索	122
(三) 当代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原则	125

三、当代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重大问题	127
(一) 关于执政党的党内民主问题	127
(二) 关于基层民主问题	132
(三) 关于实质民主与程序民主问题	135
(四) 关于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问题	138
(五) 关于民主与法治问题	140
四、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	141
(一)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动民主政治建设的政治前提	141
(二) 以执政党的党内民主推动国家民主	144
(三) 民主集中制：民主实施的基本原则	145
(四) 社会主义法制化：民主实施的保障和关键	147
 第五章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分析	148
一、政治文化及其特征	148
(一) 政治文化的涵义	148
(二) 政治文化的特征	150
二、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及其特征	152
(一) 长期遗存的专制基因	152
(二) 基础深厚的平均主义	156
(三) 自律诉求的道德本位	159
(四) 经久不衰的中庸之道	163
三、当代中国主流政治文化的形成与特征	168
(一) 当代中国主流政治文化的形成背景	168
(二) 当代中国主流政治文化的结构特征	170
四、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塑造	173
(一) 塑造当代政治文化的必要性	173
(二) 当代中国人本主义政治文化的重塑	175
(三) 社会主义功利观的认同与匡约	178
(四) 社会公正的倡导	181
(五) 中国法治文化的张扬	183

第六章 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分析	185
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程	185
(一)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起步期	185
(二)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开展期	186
(三)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调整期	191
(四)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期	196
二、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的问题	201
(一) 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同向异步的问题	201
(二) 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与政治稳定的矛盾	204
(三) 政治民主的扩大与执政党地位巩固的问题	207
三、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与路径	210
(一) 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	211
(二) 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	218
第七章 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分析	226
一、政治文明概述	226
(一) 政治文明的涵义	226
(二) 政治文明与政治现代化同步、同质性	231
二、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发展	234
(一) 政治文明发展的理念转变	234
(二) 政治文明发展的内容	241
(三) 政治文明发展的动力	245
三、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	249
(一) 政治文明建设中的主要问题	249
(二)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道路选择	253
第八章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国际环境分析	265
一、全球化：中国进入世界大舞台的机遇和挑战	265
(一) 全球化及其发展	265
(二) 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新挑战	268
(三) 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新机遇	271

(四) 迎接全球化：中国的政治选择	274
二、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思潮对我国意识形态的冲击	277
(一) 当代国际左翼意识形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277
(二) 面对国际上复杂意识形态的政治立场	280
三、渗入国际因素的当代中国敏感问题	286
(一) 祖国统一与台湾问题	286
(二) 人权与西藏问题	291
(三) “东突”与恐怖活动问题	297
(四) 钓鱼岛、南沙群岛与边界问题	301
(五) 能源与国家发展战略问题	305
 第九章 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分析	308
一、社会分层概述	308
(一) 社会分层的界定	308
(二) 经典的社会分层理论	309
(三) 当代社会分层研究	311
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	313
(一) 社会背景	313
(二) 具体表现	315
(三) 身份制体系及其特征	316
三、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结构	318
(一) 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结构	319
(二) 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基本特征	323
四、社会流动的形式	329
(一) 水平流动与垂直流动	329
(二) 代内流动与代际流动	330
(三) 结构性流动与非结构性流动	330
五、当代中国社会流动	331
(一) 农村人口的社会流动	331
(二) 城镇人口的社会流动	333

第十章 当代中国社会问题与社会政策分析	337
一、社会问题概述	337
(一) 社会问题及其特征	337
(二) 社会问题的分类	339
二、当代中国的社会问题	340
(一) 失业	340
(二) 贫富分化	347
(三) 腐败	354
三、当代中国社会政策	361
(一) 社会政策及其特点	361
(二) 社会政策在中国的发展	362
(三) 中国社会政策的主要问题	368
(四) “和谐社会”构建与中国社会政策发展	371
第十一章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现代化分析	376
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	376
(一) 社会转型的涵义及其内容	376
(二) 人类社会的三次转型及其启示	379
(三)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特征	383
二、当代中国现代化	386
(一) 现代化的涵义与内容	386
(二) 现代化理论的演进	391
(三) 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394
(四) 现代化的特征及其在中国的表现	396
三、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现代化的互动	398
(一)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现代化的互动关系	399
(二)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现代化战略体系	400
(三) 制约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因素	401
第十二章 全球化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生活变迁分析	404
一、多元视角下的全球化	404

二、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结构的影响	407
(一) 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	407
(二) 全球化给我国经济社会带来的消极影响	411
三、全球化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影响	413
(一) 全球化与中国社会的“三级两跳”	413
(二) 中国目前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和变动性	417
(三) 全球化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影响	419
四、全球化对中国人生活和心理的影响	423
(一) 网络文化与新语词体现的社会心态	423
(二) 全球化与当代中国的文化困惑	426
(三) 全球化与个体心理上的不安	427
(四) 全球化与社会交往方式的多样化、便捷化	427
后 记	428

第一章 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分析

一、政治合法性及合法性资源的涵义

“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① 它是“人们内心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认为政府的统治是合法的和公正的”，其基础是“对统治的同意”。^② 而合法性资源是指那些可以证明政治系统统治合法性的有形的物质利益或无形的价值符号。毫无疑问，任何一个既定的政治系统都必须拥有一定的合法性资源，这是它长治久安的重要政治文化条件和政治心理基础。马克斯·韦伯指出：“被统治者——至少是社会方面重要的各阶层——内部的最低限度的赞同，是任何一种统治、包括组织最好的统治的持久性的先决条件。”^③ 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指出，民众对于一个政治系统的合法性信仰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对系统合法性的一些适度的信奉，任何系统都不能延续，至少不能延续很久。^④ 也正因为如此，托克维尔在考察美国民主时说：在自然原因、法制原因和精神原因中，如果按照它们对民主制度的贡献分级的话，那么，“依我看，自然环境不如法制，而法制又不如民情”，“我确信，最佳的地理位置和最好的法制，没有民情的支持也

^① [美] S. M. 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页。

^② [美] 迈克尔·罗斯金等：《政治科学》，林震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③ [德]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82页。

^④ [美] 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336页。

不能维护一个政体；但民情却能减缓最不利的地理环境和最坏的法制的影响。民情的这种重要性，是研究和经验不断提醒我们注意的一项普遍真理。我觉得应当把它视为我的观察的焦点，我也把它看做我的全部想法的终点”。^① 其实，托克维尔在这里所说的民情，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合法性或合法性资源。

通观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一个政治系统赖以存在的合法性资源主要有意识形态、制度规章、统治绩效、领袖魅力等。对不同类型的政治系统而言，它们对这些合法性资源有不同的需求；即使同一类型的政治系统，它们在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也会有所不同。总的说来，在这些资源中间，它们或共同或其中几个或主要由其中的一个发生作用，以担当起证明这个政治系统进行统治与治理合法性的资格。而当一个政治系统进行统治与治理的合法性资源不断流失，却又未能培育其他的合法性资源以填补“合法性真空”的话，那么，这个政治系统就会出现执政的合法性危机，严重的则会导致政权的更迭。这对于通过正当的政治程序上台执政的统治者如此，对于通过政变或革命上台执政的统治者亦复如此。有鉴于此，任何一个政权莫不努力证明自己的统治是合法的，即使是主要依靠强力进行统治的政权也不例外。而那些致力于进行有效的统治与治理的政权，更是注重合法性资源的培育、开发和维护。

上述的理论设定，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国家政权同样有效。因为以前人们一直对合法性问题存在着曲解或误解，把合法性问题和非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直接画等号，而对我国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合法性问题，一概以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天然合法性”来加以回避，在事实上造成了合法性话语和合法性意识在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缺失。然而，苏联、东欧国家的剧变给我们上了深刻的一课，回避问题不仅于事无补，反而贻害无穷。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国际背景之下，人们才开始对合法性问题的重要性有所体察，才开始有了对合法性问题的研究和探讨。

二、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特征与资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

^① [法]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58页。

程。这一事实本身即反映出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拥有一定的合法性资源，因为，如果中国共产党没有可以依存的合法性资源，它也就不可能延续到今天。在这里，我们将首先阐述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特征，然后从横向的角度对中国共产党所拥有的合法性资源作一总体性的考察。

（一）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特征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特征将受制于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一般特征，所以，我们对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合法性特征的探讨，同时也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特征的说明。

那么，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特征是什么呢？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特征是和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特征相比较而言的，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从总体上看，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那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多是从体制内产生并实行“竞争性”的政党制度的。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各个政党之间可以通过非暴力的和平竞争，以和平的方式而成为执政党、获得国家权力^①，并经过法定程序进入国家制度体系，依据法律授权和制度安排来决定和管理国家事务。同时，一个明显的事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各政党并不把自己的政党理念与社会伦理、宗教信仰和国家机器一体化，而是把政党理念确定在政党政治的功能范围内。^②因此，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各个政党把在选举期间如何赢得选举的胜利和政治领导权看做是它们的主要功能之一^③，但是，它们基本上无需花费时间、金钱和精力去论证其赖以存在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问题。因为这样的政党制度“鼓励公民区别他们对整个政治体系的忠诚和针对你争我夺的政治家们的态度”，“保护国家不受公民不满引起的破坏：抱怨和攻击针对的是那些仍在其位、谋其政的官员，而不是整个制度”。^④对于执政党来说，即使它的统治绩效很差，但这只是证明这个政党的执政能力差，却基本上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问题无多大关联。在这种情况下，民众

^① 罗豪才、吴撷英：《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和政治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42页。

^②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90页。

^③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83页。

^④ [美]S. M. 李普塞特：《一致与冲突》，张华青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7—138页。

可能对该执政党不再“输入”信任和忠诚，但这并不等于民众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了怀疑。因此，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大体上只存在政府危机，而不存在政治体系、政治制度的合法性问题。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却有其独特之处。众所周知，社会主义制度通常是在一些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立起来的，它们试图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达至社会主义。这种超常规的社会制度的演进，是共产党运用“超前的政治理念”——意识形态，从体制外通过暴力的方式夺取政权而实现的。而暴力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产生了一套崭新的以政党至上、‘民主集中制’及意识形态为合法性基础的体制，有效地巩固了革命所带来的权力集中和权力扩大，并使之制度化”。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是政党政府的胜利”。^①于是，组织结构高度集中的共产党成了唯一的执政党，执政者的轮替不是在基于选举的政党之间进行，而是在共产党内部产生。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列宁曾经这样说过：“党的上层领导就是苏维埃机关的上层领导，这是一回事”。^② 1920年10月11日，列宁在给布哈林的一张便条上以直白的语言写道：“……只要以整个中央的名义声明（并论证）以下几点就够了……（3）无产阶级 = 俄国共产党 = 苏维埃政权。”^③他还说：“我们不能不把苏维埃的‘上层’与党的‘上层’融成一片，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④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具体建设实践中，则逐渐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政党制度和党政职能一体化的状况。这样一种政党制度和党政关系，就天然地使得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和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串联”在了一起，亦即党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党。有学者就曾明确指出，这样的政党制度和党政关系势必造成政党和国家的合二为一。^⑤而且，政党理念（或意识形态）还存在着一种“国家化”的趋势：政党“不仅把其政治理念上升为历史中的神圣真理，成为一种信仰，而且与统治权力和社会的

^① [美] S.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88页。

^② 《列宁全集》第31卷，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83页。

^③ 《列宁全集》第49卷，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83页。

^④ 《列宁全集》第32卷，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6页。

^⑤ [美] S.P. 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46页。关于中国的“党组织国家化”的情况，可参见郑谦等著《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发展概要》（中国共产党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一书。

制度性建制一体化”^①。这样，共产党执政中的每一行动，不仅要证明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同时还要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包括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也正是因为如此，当共产党的执政绩效保持良好时，人们不仅会对其执政也会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输入信任和忠诚；而当共产党的执政绩效出现危机时，不仅仅会对共产党执政本身构成挑战，还会对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相应的不良影响。

因此，概括地说，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如下三点：过分依赖意识形态；非竞选而产生的执政党；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串联在一起。这样的特征，对共产党执政可以依赖的合法性资源产生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二）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资源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主要有意识形态资源、政治制度资源、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资源、统治绩效资源、领袖魅力资源。

1. 意识形态资源

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指出：“意识形态能够赋予政治权力以合法性，并把政治权力转换为政治权威，而这种政治权威不仅比赤裸裸的暴力和强制来得可靠和持久，而且还能使统治阶级用最少的政治资源进行统治。”^②因此，任何一种类型的政权都离不开意识形态及其所提供的合法性支持，都需要发挥意识形态的合法化职能，即国家政权通过运用思想和文化手段塑造与影响民众的价值观念，从而使他们认可现存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并自愿地服从国家的控制和管理。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家尼科斯·波朗查斯指出：“用政治结构和机构的合法性，我们可以标明它们对一种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关系。合法性里面特别是包括有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特有的政治

^①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90页。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刘小枫认为，在于无产阶级政党“在创建之始，就不是一个纯政治性的政党，它的政党理念不是仅仅定位在政党政治的框架之内的，而是伸展到终极历史中的神圣真理领域。这一政党及其理念负担着一个人类性的终极使命”（见该书第397页）。

^② [美]罗伯特·A.达尔：《现代政治分析》，王沪宁、陈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78页。

影响。”^① 毛泽东也曾指出：“社会意识形态是理论上再造出现实社会。”^② 这可以看做是对意识形态合法化功能的高度浓缩。

对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它同样需要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支持。这个意识形态，就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③ 很明显，正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高举共产主义旗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一场伟大的革命，建立了新中国。而新中国之“新”，不仅体现在它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套全新的政治制度，更重要的是它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套全新的思想体系，即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那么，为什么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可以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呢？或者说，为什么广大人民群众能够认同和接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呢？这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以共产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发动的伟大革命，结束了长期的战乱和分裂，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事实，引发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强烈的认同。弗里德里克·C. 泰维斯对此发表评论说：国家的统一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笔殷实资产。国家统一是振兴中华的必要条件，是一切爱国的中国人衷心期盼的目标”。^④ 我们可以看到，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官僚资本主义一直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在这一过程中，曾经有各色各样的“主义”蜂拥涌入中国，陈旭麓先生对“五四”时期的情形这样描述道：“在短短的几年之内，从新实在论到尼采主义、国家主义，从柏格森、倭铿、杜里舒以及康德的先验主义到马赫、孔德以及英美经验主义、实验主义，从资产阶级启蒙时代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人文主义到旨在救治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社会主义

^① [希腊] 尼科斯·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叶林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42页。

^②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10页。

^③ 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内容有一个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到今天，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完整表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④ [美] 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王建朗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1—72页。吉尔伯特·罗兹曼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他说：“消除分裂并建立起强大而整齐划一的中央政府，这是一种深深植根于中国历史传统之中的民心所向，尤其是中国从来不存在各种相互竞争的宗教的或世俗的组织和权威，统一的呼声非常之高。这种民心所向一旦变成现实，它就具备自身向前发展的原动力。”（[美]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1—592页。）

学说……都曾化为众多中国人的言谈和文章。它们展示了当时世界的各种主要思潮，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一个比较与选择的机会。”^① 尽管这些各色各样的“主义”之间往往相去甚远，“但对于为中国寻求出路的人们来说，它们曾经是同样富有吸引力的救世真义。每一种主义周围，都汇聚过有志于救治世病的知识分子”^②。他们围绕着这些不同的主义，进行了救国救民的探索和试验，其中既有改良的又有革命的。但是在这些探索和试验中，只有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学说才为中国找到了出路，才使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③ 这一事实，自然成为人们认同和接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原因。

其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本身的吸引力。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是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的，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向人们描绘了一幅没有贫穷、没有剥削与压迫、追求实质性平等的、人人都能过上幸福生活的、现代化的美好前景和终极性的理想目标。对于长期处于战乱和分裂状态之中、饱受外国列强侵略和战乱折磨的中国民众来说，他们不仅对这样的生存状态表达了不满的情绪，而且似乎也失去了耐心，因而在向何处去的问题上，他们更易于接受那些带有激进色彩的、追求实质性平等的、表达终极价值与关怀的、能够迅速地对民族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的问题提出答案的思想观念，而中国共产党所遵奉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则恰好提供了这样的价值坐标。因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所设定的价值和目标，自然会对中国民众产生极大的吸引力，这在广大农民和工人中间尤其如此。他们以极其朴素的情感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认同和接受了那描绘出一幅强调实质性平等的、追求现代化的美丽图画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并因此而追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建立新政权之后，他们深受共产主义的乐观主义情绪的感染，不仅相信新政权能够为所有的人创造更美好的社会和更舒适的生活，而且也积极投入其中，乐意“把自己的才能和力量献给国家，并使个人的目标服从于国家的需要”^④。可以说，

^①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99页。

^② 同上书，第402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09页。

^④ [美]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82）》，李向前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35页。